

绪论

众所周知，我国的翻译文学史源远流长，从东汉佛经翻译开始，一直到现在，已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从历史的悠久和规模的庞大而言，可以说中国的翻译及翻译文学的历史，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西方的翻译活动自然也不晚。古代罗马人翻译希腊人的文献，中世纪后期拉丁文《圣经》翻译成英、法、德、意等民族语言，8世纪后的几百年间阿拉伯人翻译古希腊罗马的著作，都是古代世界翻译史及翻译文学史上很壮观的景象，但似乎在翻译时间上的持久方面，都不及中国的佛经及佛经文学的翻译——它持续了近一千年，从翻译数量规模来看，我国古代的汉译佛经多达六千多卷，总字数超过一亿。到了最近一百多年间，中国的翻译家们几乎把西方，还有东方，特别是日本的几乎所有值得翻译的作品，都翻译过来了。因此我们说，中国是世界上的翻译大国、翻译强国，似乎并不为过。

然而，中国的翻译研究，特别是文学翻译的研究长期以来被严重忽视。迄今为止，除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胡适等极少数学者在其撰写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中有文学翻译的章节之外，整个20世纪在数百种各种各样的《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教材、著作中，都没有翻译文学的内容。在论述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创作与翻译兼有及在文学翻译中成就很大的文学家时，却只

讲他们的创作，而不讲他们的翻译。造成这种状况有复杂的政治、历史、文化和文学上的原因，总体来说是不正常的。近十几年来，随着翻译学、比较文学等学科的兴起，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逐渐被重视起来。有人提出了“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或“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特殊的组成部分”的论断，得到了广泛的反响、呼应和认同。关于文学翻译的学术论文也越来越多了起来，有关翻译及文学翻译的资料集也陆续编辑出版，几种从不同角度撰写的中国文学翻译史方面的著作也陆续问世。可以说，翻译学及文学翻译研究作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学科，已经显示出它的旺盛的活力和广阔的前景。但是，有关 20 世纪文学翻译史的研究还严重地缺乏积累，许多问题、许多领域只是被初步触及，更多的问题和领域则没有被触及。对我国文学翻译的系统而深入研究正处在举步发足的阶段中。

今天，新旧世纪的交替为我们的 20 世纪文学、学术史的回顾和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机遇。站在新世纪的制高点上望刚刚擦肩而过的 20 世纪，是我们这一代学人的责任与义务。而在 20 世纪中国的学术论争中，有关文学翻译的论争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纵观整个 20 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不仅翻译作品（译作）硕果累累，与之相适应，学术争鸣也呈现出钟磬和鸣、百花争艳的局面。正如文学创作活动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研究总是相辅相成的一样，文学翻译的实践活动与文学翻译的学术争鸣、理论建设也是互为表里、互相推动的。有关翻译及文学翻译的理论探讨，总是与中国翻译及翻译文学的历史相始终的。特别是 20 世纪中国翻译史上的学术论争，更紧密地伴随着中国文学翻译的发展的历史演进进程。是 20 世纪中国学术论争和理论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在回顾和总结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学术论辩传统的时候，有关翻译文学的学术争鸣尤其不容忽视，应当把翻译及文学翻译的学术论争纳入整个 20 世纪中国学术论争的大视野中加以考察。这就是我们写作《中国文学翻译十大论争》一书的初衷和出发点。

20 世纪中国文学翻译论争，涉及的问题较为广泛，论争的起

因和背景有所差异，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样态。在这里，我们把有关论争分为十个主题，可以称之为“十大论争”——

一“信达雅”之争。由近代著名翻译家严复提出的“信达雅”，是晚清以来中国翻译及翻译文学理论中最有影响的理论命题。它既是严复翻译经验的精炼的总结，也相当程度地揭示和概括了翻译活动的本质规律。在一百多年来的中国翻译理论中，没有哪一种学说像“信达雅”一样具有如此深远和广泛的影响力。由于严复的“信达雅”只是有感而发，并未做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的界定，后来的人们或解释，或阐发，或引申，或赞赏，或质疑，或贬斥，各抒己见，众说纷纭，真正出现了百年争鸣、百家争鸣的局面。其间的争鸣出现过三次高潮：第一次是二三十年代，第二次在 50 年代，第三次高潮始于 80 年代，延续至今。通过论争，“信达雅”的历史渊源、内在含义，作为翻译及翻译文学的原则标准是否适用等一系列问题，在论争中也逐渐明晰。更重要的是，“信达雅”在论争中被不断阐发、不断完善，从而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

二，直译与意译之争。20 世纪初直至 80 年代，我国翻译文学界一直都是将直译意译作为一种翻译方法的概念来使用，并围绕直译意译进行了长时间持续不断的论辩。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意见。1 把直译理解为逐字译，并加以提倡，有的提倡直译，但不把“直译”理解为逐字译，并把直译理解为惟一正确的方法，不承认另外还有“意译”的方法，或者把直译与“曲译”对立起来，认为直译就是“正确的翻译”；2 反对逐字直译，主张通顺易懂的意译；3 将直译意译两者调和折衷，不作硬性划分，或反对使用“直译”、“意译”的提法，而主张用别的更恰当的概念取而代之，或对直译意译的内涵做进一步科学的清理和界定，主张两者的有机结合与统一。

三“异化”与“归化”之争。翻译中的所谓“异化”和“归化”是以译者所选择的立场为基本点来加以区分的。前者主要以原语文化为归宿，强调译文要有“异”于目的语；后者主要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强调译文要同化于目的语。它们在翻译中的可行性取决于翻译的目的、读者的需要、文化间相互依赖的程度等，具有各

自的价值和不可替代性。有人把归化理解为意译，把异化理解为直译，是不全面的。这一对概念都是有相互重叠的一面，如归化和意译都指译文通顺，符合译入语的语法规范等等。异化和直译都追求与原作的“等值”，尊重原语的语法规范。但归化和异化更加强文化因素，它所涉及的主要是文化立场问题，直译、意译则侧重于语言操作问题。在 20 世纪的中国翻译文学理论建构与学术争鸣中，“归化”和“异化”这一对范畴表明中国翻译文学由翻译方法论而扩展到更高层次的翻译文化论。

四，复译、转译之争。转译与复译之争是针对文学翻译的不同类型而展开的论争。由译本所据原本的不同，形成了直接翻译和转译两种不同的译本类型；由同一原本的不同译本出现的时间先后的不同，形成了首译与复译两种不同的译本类型。因已有的译本不能满足读者的期望和需要，复译是翻译家常有的选择；因翻译家所掌握的语种等因素的限制，转译也常常是译介外国文学的必要途径和方式。在中国翻译史上，复译和转译是相当普遍的译本类型，其中不乏成功的、受到读者欢迎和肯定的译作，也有不少过多背离原文的转译本和重复平庸、乃至滥竽充数的复译本，对于复译和转译的是非功过，翻译界有着见智见仁的不同看法，并进行了长期的讨论和争鸣。

五，“处女”、“媒婆”、“奶娘”之争。翻译文学的价值、功用问题，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的关系，特别是文学翻译对作家创作所起作用问题，是中国翻译文学的理论探讨的一个重要论题之一。对翻译文学在政治文化层面上的价值、地位和作用，人们的认识是大体一致的。关于这个问题并无太大争议。只是翻译文学究竟“功用”在何处，不同时代、不同的人的认识还是有差异的。人们对翻译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的认识，也经历了从现实的、政治的工具论，到文化、文学本体论的发展演化过程。而在文学层面上，特别是在翻译与创作的关系问题上，人们的看法却大相径庭，并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在论争中，有人将创作比作“处女”，将翻译比作“媒婆”，认为文学翻译只起一个“媒婆”的作用，与“创作”这个“处女”相比是

次要的。有人则将翻译比作“奶娘”，认为翻译促进了创作，对创作有哺育之功，因而翻译是创作的“奶娘”。形象一点说，这一论争就是“处女”、“媒婆”、“奶娘”之争。

六、形似神似、等值等效之争。“形”与“神”、“神似”与“形似”，原本是中国传统的文论和画论范畴。在 20 世纪中国翻译文学理论构建中，有些翻译家和理论家借鉴这两个传统概念，来表达翻译文学中的艺术追求。后来，钱钟书等又在“神似”的基础上提出了“化境”这一概念，作为翻译文学的一种理想境界和目标。而从外国引进的“等值”、“等效”理论与“神似”、“化境”论一样也属于翻译文学的理想目标。长期以来，翻译界对“形似”与“神似”的关系、“神似”与“化境”的关系、“神似”、“化境”与“等值”、“等效”的关系，都做了有益的论争和辨析。特别是对从外国引进的“等值”、“等效”理论，推崇者有之，质疑者有之，反对者有之，各种不同看法在 80 年代至 90 年代形成了交锋。

七、“可译”与“不可译”之争。“可译”与“不可译”是翻译理论中的一个古老的悖论，是翻译理论，特别是文学翻译理论中的一个矛盾的、二律背反的命题。可以说，人类以往的翻译活动，都是在“可译”与“不可译”的矛盾统一中，在不断克服“不可译性”，追求“可译性”的努力中向前推进的。所谓“可译”或“不可译”（或称“可译性”、“不可译性”）是指在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特别是诗歌翻译——中，对原文加以确切传达的可能性的程度和限度问题，也就是翻译的可行性和局限性的问题。它从根本上触及到了翻译及文学翻译的可靠性和可信性、作用和价值认识与判断。“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论争，从西方自古罗马时代，我国自魏晋时代就已触及展开。进入 20 世纪后，仍是我国翻译文学论争中的持续较长的论题之一，在许多方面触及了翻译及翻译文学的某些根本特征，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八、翻译文学国别属性之争。“翻译文学”是“文学翻译”的结果，也是文学文本的一种类型。在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中国翻译文学的学术争鸣和理论构建中，关于翻译文学的归属问题的

论争是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特别引人注目。由于“翻译文学”特有的跨文化性质，人们对什么是“翻译文学”，它的内在属性是什么，翻译文学应该如何定性和定位，翻译文学是否等于“外国文学”，是否是一个独立的文学形态，中国的翻译文学是否属于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等等，都有着不同的认识，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通过论争，“中国翻译文学属于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的论断，为翻译界、文学界和理论界的大多数人所赞同，从而一定程度地扭转了长期以来翻译文学被忽略的、被无视的不正常局面。近年来，对于翻译文学的基本理论、对于翻译文学史的研究已成方兴未艾之势，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翻译文学归属问题的明朗化。

九、“科学”论与“艺术”论之争。对翻译的特殊性的探讨的第一步，是弄清文学翻译的根本的学科属性，即翻译——包括文学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长期以来，人们对文学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争论。从语言角度看问题者，倾向于将翻译视为一种科学活动，从文艺角度看问题者，则倾向于将文学视为艺术活动，从而形成了“语言学派”和翻译的“文艺学派”两大分野。他们在翻译家的客体性与主体性、翻译活动的主观性和客观性、翻译理论的描述性和规范性等问题上，都表达出了不同的看法。与此同时还出现了试图将两者调和起来的“艺术与科学统一论”。在“艺术论派”内部，人们对文学翻译的特点和性质的认识也颇有分歧。80年代以来，围绕许渊冲先生提出的“美化之艺术”论“优势竞赛论”，翻译界进行了热烈的争论，并一直持续到新世纪。这场争论集中反映了文学翻译中的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涉及到译者在翻译中的创造性可以容许到多大程度这一重大问题。

十、关于“翻译学”的论争。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降，在我国，不少学者在外国学术界的启发下，提出了建立“翻译学”的构想，发表了很多文章，出版了若干专著。虽然有些著作得到了评论者的高度估价，但毋庸讳言，它们大都只是初创和探索的性质。其中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没有解决，并存在很大分歧。这些分歧都在围绕“翻译学”的学术论争中充分表现了出来。争论的焦点问题

是第一 翻译学有没有建立的必要 能否建立起来。一派认为“翻译学”不可能成立 它只是一个“迷梦”、一个“未圆且难圆的梦” 另一派相反，认为建立翻译学是必要的必然的现实的，并且在我国也已初步形成；第二，怎样建立翻译学？这主要涉及到在翻译学的理论建构中，是以中国已有的译学理论为依托，还是以西方理论为依托，如何看待中国传统译论的民族特色？在译学理论建构中它应发挥何种作用？如何看待借鉴西方译论？一派认为我国已经形成了自成系统的翻译理论，应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另一派认为中国翻译理论是不成熟的和落后的，翻译学的建立应走国际化的道路。

在对上述十大论争的清理、总结和评述中，我们深感近百年来，中国文学翻译论争的论题是鲜明突出的，论争的内容、角度和方式是丰富多彩的，论争的学术含量和理论含量是较高的。有关文学翻译的论争是与中国文学史、中国学术史的发展演进历程密切相关的。从纵向上看，十大论争贯穿着整个中国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同时由于时代背景的不同，论争高潮相对集中。20 年代至 30 年代和 80 年代至 90 年代是论争的两个高峰，十大论争中的大部分论争都集中在这两个时期。显而易见，这两个高峰期的形成是与中国整个学术文化的繁荣期相一致的。从论争的主题内容上看 是由浅入深、逐步推进和深化的。例如 在 20 世纪上半期，围绕“信达雅”的论争的宗旨 是为文学翻译确定一个基本标准 接着展开的直译和意译之争是翻译的基本方法问题，转译复译问题则是翻译的方式问题。到了 20 世纪下半期，在关注翻译的实践层面的问题之外，开始更多地关注文学翻译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如形似神似、等值和等效问题的争论 已经由“文学翻译”上升到了“翻译文学”。这一论争和“信达雅”论争的不同 就在于“信达雅”论争是有关实践问题的，而围绕“神似”的论争则关涉翻译文学的美学理想、审美境界 是对已经完成的“翻译文学”文本的审美观照和审美评价。又如异化归化之争，如果说 30 年代的论争旨在说明什么样的译文更可取，那么到了 80 年代至 90 年代的异化归化之

争，则主要指向探讨翻译文学的文化立场，翻译家的文化取向问题。同样，可译不可译之争也发生在 30 年代，但那时所探讨的主要是文学翻译实践层面的可译与不可译，而 20 世纪后半期的论争则深入到了文学的翻译本质特征的层面，把可译不可译问题作为翻译中的一个哲学问题、美学问题来看待。还需要强调的是，80 年代至 90 年代参与争论的不再是清一色的翻译家，而是涌现出了一些专门的翻译研究家和译学理论家，理论与实践的相对分工已初露端倪。翻译论争及文学翻译论争的议题，也不再局限于某些个别的实践问题，而是更多地上升到了学科建构的高度。例如，关于翻译文学的国别属性文学的争论，其实质是要为翻译文学争取学科地位，争取存在空间。翻译的“科学”论和“艺术论”之争，其宗旨更是从学理上辨明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的本质属性和基本特征，从而为翻译及文学翻译的准确定位打下基础。而关于“翻译学”的论争，则是 20 世纪中国翻译文学论争的总结形态，是围绕学科本体的论争，突出表明了 20 世纪末期翻译界对中国翻译及文学翻译的学科建设问题的高度关注，这个问题的争论也一直延伸到了新世纪，而翻译学及翻译文学的学科建设也在论争中稳步地向前推进。

在清理、总结和评述中国翻译及文学翻译论争的过程中，我们还感到，中国文学翻译的论争始终是中国翻译论争的焦点和核心，在中国的翻译理论建构中具有主导位置。一方面，中国翻译文学的论争是中国翻译论争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而谈文学翻译的论争，不可能完全局限在文学翻译自身的范围内。另一方面，在 20 世纪我国翻译论争乃至译学理论建构中，呈现出较强烈的“泛文学化”的色彩。不论是否直接关涉文学翻译问题，论争都具有不同程度的文学性或文学色彩。“文学论”的色彩极为浓厚，相形之下“科学论”的色彩较弱。许多学术观点和理论主张实际上是从文学翻译出发的。参与论争的大部分翻译家是文学翻译家，他们的文学翻译经验对他们的翻译主张、理论立足点都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可以说，20 世纪中国翻译论争的核心和焦点在文学翻

译。90年代后,虽然也有了强调科技翻译、学术翻译研究的呼声,但总体而言,文学翻译仍是翻译理论争论的最基本的背景。

就论争的方式来看,中国翻译文学中的所谓“论争”不仅仅是通常意义上的“争论”,大部分情况下是“争”为“论”,起以“论”为本,“论”中有“争”。论争的方式也各有不同,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情况。但粗略划分起来,可以说有两种基本的论争方式,一种是直接论争,论争双方在相对集中的时间内,以特定的人物为对手展开论辩,多是指名道姓。十大论争中,30年代鲁迅与梁实秋等就直译硬译问题展开的论争、90年代就劳陇、张经浩两人反对建立翻译学而引发的论争、关于中国译论与西方译论的价值判断的论争等等,都属于直接论争。直接论争的烈度较大,双方常常唇枪舌战,各不相让,有的已上升为比论争更激烈的“论战”。这类论争的特点是短兵相接,各执一端,论题集中,立场鲜明。总体看来是学术的,但有时也免不了中国文坛、译坛中的宗派主义的、党同伐异的倾向,或因带有个人的情感意气乃至成见偏见,影响了论争的学术性和科学性。譬如有的论者在论争中缺乏与人为善的态度,将学术论争与人际关系、长幼尊卑混为一谈,经不起别人的学术的批评,在反批评中有失学术立场。这都是直接论争中难以避免的负面。另一种方式是间接论争。即论争双方的对垒并不明显,论争的时间不太集中,有关的文章主要并不是为论争而写,而是顺便提到,或一带而过,或旁敲侧击。这类间接论争时间上不集中,参与的人数较多,且往往历时很长,旷日持久。如信达雅之争,直译意译之争,异化归化之争等,几乎都持续了近一百年,其论争本身就构成了中国翻译理论史的一条重要线索和一个重要侧面。在中国翻译文学论争史上,直接论争和间接论争两者互为补充,直接论争往往容易形成焦点和高潮,间接论争却能连绵不绝。

翻译文学的学术争鸣是20世纪中国翻译理论建设的重要形态,论争涉及到了文学翻译的方方面面,提出了一些发人深思的基本的问题和课题,也集中表现出了学术论争在理论建构中的作用和局限。一方面,论争中提出了一系列基本问题,通过争论,使这

些问题为更多的人所关注；通过辨析，使问题逐渐明朗化，为进一步解决问题提供了基础和条件；另一方面，参与论争的大部分是有着一定翻译实践经验的翻译家，而且多是有感而发的随想式的、“经验谈”的文字，其中的看法虽不乏切肤之痛和真知灼见，但常常是思想的星星之火，而不是理论的火焰燎原。这自然不能责怪翻译家未能将他们的见解理论化。这只能说明，文学翻译论争还不是文学翻译理论的完成形态，但它却是文学翻译理论乃至整个翻译理论和译学建构的珍贵资源。翻译文学理论研究的深化，既要靠翻译家兼理论家的双料人才，更呼唤专门的翻译理论家和专门的翻译理论研究者的出现。而今后专门的理论家要对文学翻译做出理论上的全面深入的概括和提升，若忽视、或者不能充分利用 20 世纪文学翻译论争所留下的这些宝贵材料，是不可想像的。

对 20 世纪中国文学翻译论争做系统的清理总结和评述，是一项此前没人做过的新的工作。本书的作者不是这个领域的专门家，只是带着学习的态度和心情，尝试着写完了这么一本小书。我们一开始就意识到，这应该是一本以资料性为主要特色的书，推想读者如购买和阅读此书，主要目的恐怕还不是关心本书作者的学术观点如何，而是期望从中了解当年论争的真实情况，获取有关的信息。因而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十分注意对资料的全面收集和消化，本着尊重历史、尊重当事人的态度，如实地选择、甄别和引述有关的史料和言论，将各家观点都摆出来，将各次论争的历史面貌客观真实地呈现出来，既应该找出双方的分歧点，更应该看待双方的接合点，在对立中寻求统一，在矛盾中寻求整合。自然，在这当中，我们自己对论争的看法和评论也不可缺少，但我们知道，学术问题很复杂，常常不是一个简单的是非曲直、非此即彼的问题，论争双方都持有“片面的真理”，论争才能持续下去，否则，如两军对阵，一方不堪一击，很快就可以鸣锣收兵，论争就没有了对手。论争、论战本身之所以有学术价值，就因为双方是对立的统一。我们是在呈现历史、描述历史，所以始终注意小心翼翼地不以个人的一己之见来妄断是非，不恣意凸现和放大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和学

术倾向。生怕有失客观和公正。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甘愿将自己的主体性淹没在一大堆的史料中。实际上，对史料如何处理、如何组织、如何取舍、如何叙述，都暗含着作者的主体性。同时，在我们以为应该旗帜鲜明地表达自己看法的时候，也大胆地说出自己的判断，而不取模棱两可的暧昧态度。至于在写作中史料收集的疏漏、定位的不准、评述的不确、估价的不当，肯定难以避免，还需要恭请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正。

中国文学翻译的学术论争，是 20 世纪中国文学翻译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换言之，20 世纪中国文学翻译史是文学翻译论争的历史背景。不能脱离 20 世纪中国的文学翻译史来孤立地评述翻译论争。因此，在对文学翻译论争进行系统评述之前，有必要首先对 20 世纪中国的翻译文学史做一简略的考察。

一、近代：翻译文学的肇始

要考察 20 世纪中国的文学翻译史，必须首先追溯到 19 世纪晚期开始的近代翻译文学。

鸦片战争以来，由于受到外国列强的威胁和挑战，中国由长期的闭关自守而被迫打开国门。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开始大规模学习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在这个过程中，兴起了一股持续不衰的翻译热潮。这股翻译热潮对我国的近代化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其中，文学翻译在整个中国近代翻译中，数量比重越来越大，地位越来越重要，对中国文学的近代化推动作用也越来越巨大。为了弄清楚近代翻译文学的总体状况，我们先来了解一组与之相关的数据。阿英著《晚清小说目》一书中，收录创作

420篇 翻译 587种 共 1007种(注,除去发行年月不详的和 1912年以后发表的作品);《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中的《文学理论·世界文学·中国文学》篇收录的 1912年到 1920年的创作有 322种 翻译有 395种 共 717种;《20世纪中国文学大典》^[1]将清末民初作为一个完整的时期,收录的创作是 59种 翻译是 51种 共 110种;根据日本学者樽本照雄的统计,1902年至 1918年间 翻译小说共有 4362种^[2];按郭延礼的粗略估计,从 19世纪 70年代到五四运动 翻译小说有 2569种 翻译诗歌近百篇 翻译戏剧 20余部^[3]。尽管这些数据统计依照的标准有所不同,与本土文学创作相比,我们仍然可以看出近代翻译文学的繁荣。随着翻译文学的兴盛 就出现了探讨翻译问题的文章 翻译理论与翻译文学理论也由此发轫。在翻译理论方面,近代最早提出翻译理论见解的是严复。严复在《天演论》初刻本《译例言》中说:“译事三难 信达雅”,并论述了信达雅之间的关系。严复的这篇《译例言》是我国现代翻译理论的滥觞 并在此后一百多年中国翻译理论中独领风骚 不断被阐释和发挥 成为我国翻译——包括文学翻译的基本原则 有力地促进了我国译坛对翻译文学的理论探讨。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受到外国列强的威胁和挑战,中国由长期的闭关自守而被迫打开国门 在“以夷制夷”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 开始向西方学习。近代翻译运动由此兴起。起初的翻译集中在自然科学著作 然后是社会科学 到了 19世纪 70年代后,文学翻译逐渐增多。1871年 王韬和张芝轩合译了《普法战纪》中的法国国歌 即《马赛曲》 和德国的《祖国歌》,是我国最早出现的译诗。1872年发表的署名“蠡勺居士”译自英文的《听夕闲谈》是近代第一部翻译小说。随后十几年间 小说 诗歌等翻译作品时有出现 但数量不多 译品大多不标明原作者 译者不用真名 译作多为节译 大都刊载于报刊 独立印行的翻译文学仅有寥寥数种。1895年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 仅仅引进西方的技术是不够的 还必须输入新的思想学术 以求中国人精神面貌的更新。自此,思想界和学术界进入了一个大

力译介西学的新阶段。翻译家们开始认识到了文学和文学翻译所能起到的重要作用，文学翻译逐渐成为一种自觉的、有意识的行为，而获得了独立性。1897年严复与夏曾佑在天津《国闻报》上登出一篇《本馆附印说部缘起》长文，阐述了小说及小说翻译对于政治的重要性。次年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明确提出“特采外国名儒撰述，而有关切于中国时局者，次第译之”。

最早被译介过来的是政治小说。政治小说作为一种题材类型的小说，原从英国传入日本，中国翻译的政治小说也大多是日本的政治小说。其中梁启超翻译的柴四郎的政治小说《佳人奇遇》（1901）非常有影响。此后被翻译过来的影响较大的政治小说有矢野文雄的《经国美谈》（1902）、末广铁肠的《雪中梅》（1903）、广陵佐佐木龙的《政海波澜》（1903）等。这些小说对培育读者的近代政治观念、增强民族意识起到了积极作用。

该时期侦探小说的翻译也风靡一时。早在1896年至1897年间，《时务报》上刊载了张坤德翻译的英国小说家柯南·道尔的四篇侦探小说，总标题为《歇洛克·阿尔唔斯笔记》（阿尔唔斯现译福尔摩斯）。1902年，《新小说》杂志设有“侦探小说”专栏，刊载了日本黑岩泪香的《离魂病》、《毒药案》、法国鲍福的《毒蛇圈》。1903年，《绣像小说》杂志从第4号起，连续刊载翻译的侦探小说。周桂笙、包天笑、陈蝶仙、周瘦鹃等也因译侦探小说而名噪一时。他们的译作还很快催生了大量中国式的侦探小说。在《晚清小说史》中，阿英虽然认为大批侦探小说的产生“显示了翻译‘发展到歧路上去’”。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当时的译家与侦探小说不发生关系的，到后来简直可以说是没有。如果说当时翻译小说有千种，翻译侦探占五百部以上。”可以说，侦探小说在晚清的出现和盛行，迎合了当时所倡导的改良政治、启迪民智的时代潮流。

晚清社会对科技的追求和向往，使科幻小说在翻译文学中别树一帜。梁启超、鲁迅等都曾撰文，希望用通俗的科学思想来挽救众多麻木不仁的中国人，强调科学理想对民族精神的振奋作用。在这种背景下，西方科幻小说被大量译介过来，在20世纪最初十

年，科幻作品的译介总数在一百部以上。西方科幻小说第一部严谨的中译本是 1902 年《新小说》创刊号 1902 刊载的法国儒勒·凡尔纳的《海底旅行》。此后 逸儒翻译凡尔纳的《八十日环游记》（1900）、梁启超译佛林玛里安的《世界末日记》（1902）、鲁迅译凡尔纳的《月界旅行》（1903）、海天独啸子译押川春浪的《空中飞艇》（1903）、吴趼人译菊地幽芳的《电术奇谈》（1905）、周桂笙译凡尔纳的《地心旅行》（1906 等名作 都以其解说科学探求新知的特点和大胆而又富于幻想的色彩，开阔了中国读者的视野。

1899 年林纾翻译的法国作家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掀起了译介和创作言情小说的高潮。小说问世后 风行域内 人们争相阅读 赞赏有加。严复写诗赞道：“可怜一卷《茶花女》 断尽支那荡子肠。”^[4]这部小说为中国的言情小说提供了一种新的价值模式：只要是出于纯真感情的恋爱 都是值得歌颂的。可以说 此后中国的言情小说翻译与创作浪潮 都与《巴黎茶花女遗事》这部翻译小说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如徐振亚创作的《玉梨魂》讲述一名寡妇和恋人之间的感情 作品渴望自由恋爱婚姻自主 歌颂了勇于为爱牺牲的精神。作者还称自己是“东方仲马”。

其他类型的小说还有社会小说、理想小说、教育小说、法律小说、历史小说等 虽然它们的数量不多 但说明翻译小说的题材类型逐渐走向完备。

1907 年后，近代翻译文学进入繁荣时期。该时期翻译作品数量增多 作品种类更为完备。

在小说翻译方面。据徐念慈在 1908 年《小说林》上发表的一份《丁未年 1907 小说界发行书目调查表》中提供的材料 仅在这一年的翻译小说就达 80 种。该时期登载翻译文学的期刊主要有《月月小说》、《小说林》、《竞立社小说月报》、《中外小说林》、《小说七日报》、《新小说丛》、《扬子江小说报》、《小说时报》、《小说月报》、《游戏杂志》、《民权素》、《中华小说界》、《小说丛报》、《礼拜六》、《小说新报》、《青年杂志》等近三十种。其中，《月月小说》在阐述办刊宗旨时 明确把“译”放在第一位。《小说林》的宗旨是“输进欧美文

学精神，提高小说在文学上的地位”。可见刊物对翻译文学的重视。与以前相比，增加了“虚无党小说”等种类。短篇小说翻译蔚然成风，中篇小说大量涌现，还出现了单行本形式的短篇小说专集。鲁迅、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1909）作为第一部外国短篇小说的较为全面的选译本，开翻译的新风气之先。

在戏剧翻译方面，1904年我国第一份戏剧杂志《二十世纪大舞台》创刊，创办人陈去病、柳亚子等非常不满当时戏剧严重脱离现实的状况，大力提倡从文学入手来改革戏剧。1907年2月，我国第一个由留日学生组织的话剧团春柳社在东京上演了小仲马的话剧《茶花女》第三幕。这也是我国第一部翻译戏剧。6月，春柳社又在东京上演了《黑奴吁天录》。同年，上海也成立了春阳社，上演了许天啸根据林译小说改编的《黑奴吁天录》。所以戏剧界规定1907年为中国话剧界诞生年。1908年，李石译出波兰廖抗夫的剧本《夜未央》。随后，他又翻译了法国蔡雷的《鸣不平》。陈冷血翻译了法国柴尔的《祖国》。包天笑翻译改编了莎士比亚的剧本《威尼斯商人》（剧名《女律师》等）。

在诗歌翻译方面，该时期苏曼殊、马君武、胡适等人的诗歌译作较引人注目。1908年至1911年间，苏曼殊先后发表译诗集《文学因缘》、《拜伦诗选》、《潮音》。译有拜伦、雪莱、彭斯、歌德等人的诗歌。1914年，《君武诗集》刊行，内收有马君武的译诗三十八首，如歌德、席勒的作品。胡适在这段时期译介了苏格兰诗人堪白尔的《军人梦》和朗费罗、歌德、拜伦等人的诗。其他译介诗歌的作者还有辜鸿铭、刘半农、应时、陆志韦、赵元任等。在散文、散文诗、童话故事等翻译方面，屠格涅夫和泰戈尔等人的散文诗在这个时期均有少量译介。格林、安徒生的童话以及华盛顿·欧文、兰姆等人的散文、游记也有翻译。

总之，清朝末期至民初的四十多年间，是中国翻译文学走向独立发展的转型时期。至此，文学从宗教翻译、科技翻译、学术翻译中脱颖而出，成为我国翻译事业中最繁荣的一个部门。而且在数量上超过了本国文学创作。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阿英在

1935年出版的《晚清小说史》最后一章——第十四章《翻译小说》中开宗明义地说：“如果有人问晚清的小说究竟是创作占多数，还是翻译占多数，大概只要约略了解当时情况的人，总会回答：‘翻译多于创作。’就各方面统计，翻译书的数量，总有全数量的三分之二。虽然其间真优秀的并不多。而中国的创作，也就在这汹涌的输入情形之下，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晚清翻译文学的突飞猛进，为此后翻译文学的更大规模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也对中国作家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参照。

这一时期翻译文学总体上呈现出探索的、未成熟的特点。这表现在译者大都没有严格区分翻译与创作的界限。许多译者的翻译实际上谈不上是严格的翻译，而是以原作为底本的创作。传统佛经翻译中的尊重原文的“案本而传”的翻译传统一时难以为继。翻译家普遍抱着急功近利的态度从事翻译，强调翻译文学的工具性与功利价值，而对原作的著作权、原作的独特的民族文化内涵、民族形式等则不甚措意。许多译作在出版时不署原作者的名字，不标明原作者的国籍。译者普遍以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观念与形式对原作加以变形和改造。表现在作品的名称的翻译上，大多数译者都根据中国读者的习惯对原作的书名加以改造，写成了《××记》、《××传》、《××情史》、《××缘》、《××录》之类。作品中的外国人名、地名、称谓等异域色彩浓厚的东西，也大都改成中国式的人名、地名、称谓。译者还较为普遍地改造原作的体式，如几乎所有的译诗都采用了中国传统诗的形式，或译成五言古体，或是四言“诗经”体，或是“楚辞”体。将莎士比亚的戏剧翻译成故事体，用中国章回体小说的体式来替换外国长篇小说的框架结构，分章标回，有些还讲究回目对称。更多的译者对原文随意增删，主张“译者宜参以己意，当笔则笔，当削则削”^[5]，这实际上是用中国瓶装洋酒，用中国酒兑洋酒，也就是将外国文学加以中国化改造，使之靠近中国文学，使之“像”中国文学。即对外国文学加以“归化”。由于当时懂西文的译者不多，大多数是从日文译本的转译。当时的日文就盛行“豪杰译”，对原文就不甚忠实，中文更是多一层隔